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 发展历程及主要领域

倪延年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活动领域亟待探讨。当代新闻事业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的所有方面, 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态建设、社会氛围建设、国家形象建设和公民素养建设等。探讨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参与上述诸领域“国家治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目标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键词: 当代新闻史研究; 国家治理研究; 新闻业与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2-0002-08

当代新闻事业即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国家治理”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指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多元共治。二是由国家实行治理。国家成为治理的主体, 由国家对社会组成要素进行统治和管理。本文的“国家治理”取“对国家进行治理”的意义, 研究新闻事业通过新闻活动参与“国家治理”的有关问题。

一、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考辨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当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 因为只有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成立才标志着“中国当代”的正式开始。但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起点和基础,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产生发展也有其历史的基础。而它们产生发展基础的出现则要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产生发展的基础诞生后, 也就意味着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也就开始“起源”了。

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环境中创建的红色新闻事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学者依据《新青年》在1917年12月第7卷第1号所载《本志宣言》中的“抛弃军国主义(意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意即资本主义)”“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 树立新时代的精神, 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 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新青年》所载《本志宣言》表示“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对于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的思想, 明确标志着《新青年》月刊从第7卷第1号起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刊物的转变, 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起源的标志,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起源。^[1]不久, 第一种以“共产党”为刊名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共产党成立后的

1923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种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创刊，同年先后创刊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以及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党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体系的基本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体系初成。而后一路走来，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先后经历了《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新中华》《解放日报》等发展阶段，直到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华北《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期号续前，新中国成立后仍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中《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总工会和中国共青团联合机关报。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文件、法令、政策，积极进行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帮助党和政府进行战争动员，保卫和扩大红色根据地。显然这些新闻活动，已经直接且明确地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治理”。历史已经证明，《红色中华》报在当时的国家治理（红色根据地经济文化工作、扩大红军工作及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北《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告及公告性文件的办法》规定：凡属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闻，均应交新华通讯社发布，并由《人民日报》负责刊载；如各种报刊所发表的文字有出入，应以新华通讯社发布、《人民日报》刊载的文字为准。^[2]可见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国家治理工作，并且在国家治理工作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突然产生的，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独立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即建立红色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1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12月22日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旨在领导工农大众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第一个由工农当家作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由此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设想和实践，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最早尝试和实践预演。当时《红色中华》参与“国家治理”的对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根据地各级政府、抗战时期在国共合作抗日环境中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成立的解放区政府，都是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对象的前身。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新闻事业及工农政权新闻事业诞生之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的新闻活动显然是当时“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可溯源至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两个中央政府都是共产党领导，第一任主席都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完全可认定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和基础。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正是在革命先辈创建红色新闻事业和红色工农政权基础上的发展、延伸和弘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成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参与“治理”的“国家”也就由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1949年10月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二、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中国的历史车轮轰然驶进了

“中国当代”这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开始书写自己的“当代史”。中国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也随之进入“中国当代”这个历史阶段。回顾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4 年 9 月 20 日通过并公告实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前的近五年时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到第一部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制定公布并实施,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胜利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并具有深远影响的斗争,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4]

在这一阶段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动员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完成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新闻事业战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和召唤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国家治理”的中国实践,较好履行了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重要方面军”的功能。以参加经济建设方面的“国家治理”为例,全国新闻事业工作者围绕中心任务,统筹新闻报纸、时事刊物、广播电台和新闻通讯社各方力量,及时向社会各界传达党和政府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及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宣传报道发展经济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成就,展示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面貌,充分报道经济建设中的先进人物,激发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5]例如,《人民日报》首先是在 1950 年 6 月全文刊登毛泽东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同时配发了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人撰写的社论,后来又连续发表一批结合实际解决重大问题的评论和新闻。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央执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人民日报》还先后发表了《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经会议》和《度过困难就是光明》等多篇通讯。《人民日报》的这些新闻活动,毫无疑问是通过新闻事业的独特方式对“国家治理”的直接参与,也毫无疑问对国家在“恢复国民经济”这一“治理”领域有关工作的顺利推进并收到预期效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新闻事业的各要素(报纸、杂志、电台、通讯社)也都以各自专业的方式,积极参与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国家治理”,同样发挥了新闻事业的独特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 1954 年 9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告实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前近 25 年时间。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并因各种原因出现各种挫折和失误,最后又在党的领导下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明显特征是错综复杂且多变,政治运动不断。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后,农村进入互助组向合作社发展的阶段,农村生产力得到明显提高;大中城市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正确,进展非常顺利;志愿军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挫败敌人的狂妄野心,把战线巩固在“三八线”,迫使美韩和中朝签订“停战协议”,为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农村合作化运动持续推进,苏联大规模援助的工业化建设项目效果渐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国家实力有了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彰显。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不久又发生“波匈事件”。蒋介石集团在

美国支持下图谋反攻大陆，国内也出现群众闹事等未曾预料的情况。阶级斗争气息越来越紧张。为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上演，中共中央决定于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运动。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征求对党的工作与整风的意见。由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等右派言论和主张^[6]，全国规模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展开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了长期冤屈和磨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5](210-213)}。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下，政治运动或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如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一打三反”，以及文艺界批判武训、胡风及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等接踵而来，然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这一趋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又因林、陈和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企图趁乱夺权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这场史无前例的混乱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宣告结束。

“反修防修”即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4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7]。由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的“重要任务”，因而“反对修正主义”迅速成为当时“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新闻事业迅速“参与”到这一具有“国家治理”性质的重要工作中来。根据统一部署，《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重磅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列宁主义万岁》，批判苏联共产党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方面一系列“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在中苏两党矛盾激化并逐渐公开后，《人民日报》从1962年底到1963年3月先后发表了7篇批驳苏联共产党攻击中国共产党言论的文章。在欧洲一些共产党跟着苏共攻击中共的国际形势面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自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称为“九评”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和党的尊严^{[5](220)}。在国际上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的同时，1962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基本判断，决定“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8]。国内反对修正主义主要是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全国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迅速参与到这一具有“国家治理”性质的重要工作中来。除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其他中央一级乃至省级报刊都积极参与。自1963年下半年以来，各地的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篇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教育的材料。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中，新闻媒体不仅成为阵地，而且成为先锋。上海的《文汇报》率先发表批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开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恶例。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策划并由《文汇报》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6](561)}

（三）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拓创新和探索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9]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闭幕，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年11月14日在北京闭幕前近35年时间。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为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分析造成当时“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的原

因之一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指出“中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后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就是“解放思想”。^[10]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新闻界迅速进行“拨乱反正”，开始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利用新闻媒体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罪行。由于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以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肯定为前提，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还在继续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话语。^{[5] (245)}如《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的社论中就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称为“两个凡是”），在当时思想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邓小平同志代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做出的“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判断，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判断和决策，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重要任务，也是当时“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1]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及“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12]。有着切身感受的新闻界迅速加入到推动“解放思想”的行列，并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参与这一特定的“国家治理”工作。《人民日报》在1977年3月26日刊载了一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文章，其中《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因为是一组文章中的一篇短文，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足够关注。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载长篇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篇经《光明日报》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负责人反复修改，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定稿^[13]的重要文章。次日（5月11日），该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方式在《光明日报》发表，由于《光明日报》的社会影响，很快引起社会的关注。《光明日报》发表该文的第二天（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转载。紧接着，《人民日报》于6月16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解放军报》于6月24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又于9月25日发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全国范围内很快兴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为后来不断扩大深化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有利的舆论氛围。这是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继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14]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的发展时期。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全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生的党员组成，是一批“共和国培养”的共和国领导人。

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必然也必须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没有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民族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不可能有当代文明和文化的繁荣和兴盛。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倡导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具体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共十八大提出在社会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国家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15]由此可见，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倡导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是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责任和途径。

201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全国新闻业界不同类型新闻媒体和全体新闻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16]，迅速持续参与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的“国家治理”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中央级新闻报纸迅速安排在重要版面刊载阐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章、新闻消息和专题评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新闻报刊，也密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按照统一部署安排重点时段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传播，采用新闻报道、新闻评论、访谈节目、专题节目等传播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多时段、全空间地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立建设运行的商业网站如新浪、网易、搜狐等新闻网站及传统媒体建设的新闻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凤凰网等也都采用多种节目形式宣传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使是都市类晚报及行业性媒体，也都积极履行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责任，积极发挥自身贴近生活、贴近受众的传播优势，出版适应分众化传播的专版、增刊，联系群众身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在生动活泼的日常新闻传播活动中引导受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新闻业界和新闻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国家治理”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全国上下更加团结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社会风气持续向好，公民素质不断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保障。

三、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主要领域

当代新闻业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由传统纸质媒体（新闻报刊）、传统非纸质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台及新闻电影）和依托互联网建设运行的商业新闻网站、传统媒体新闻网站以及微博、抖音及手机媒体等网络化多媒体组成的综合性媒介体系。新闻人依托当代新闻业体系可把获得的新闻消息和新闻言论及时传播给特定的受众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营造或形成特定的社会舆论热点，产生即时性新闻传播效果。

（一）政治生态建设领域

政治生态是特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同时也指政治主体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它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管理者的从政行为。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依托新闻媒体，多途径、多形式、多手段地向社会受众传播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信息，宣传传播党和政府及社会团体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后取得的社会积极效果，发表符合人民利益的具有建设引导性的新闻评论，对于维护合法的政治制度，弘扬积极的政治文化，建设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具有直接而明显的舆论营造和引导功能，成为完成“国家治理”中“政治生态建设”这一重要工作任务不可忽缺的有生力量。

（二）社会氛围建设领域

社会氛围是围绕社会生活领域各类活动主体的且客观存在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综合气氛和环境。政治生态更多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发展状态。社会氛围则主要是指社会生活领域除政治主体以外的民间层次社会生活主体在政治环境之外的日常社会生活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状态，更多地反映了民俗、民气、民意、民愿和民风等基本社会要素，是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基础。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通过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信息，宣传社会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介绍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批评错误、鞭挞丑恶，传正道新闻、扬社会正气，营造和人人向善向好、个个奋发努力、相互友善互助、建设美好未来的社会氛围，成为“国家治理”中“社会氛围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和力量。

（三）国家形象建设领域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是指反映在新闻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当代新闻事业参与新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国家形象建设”，包括面对国内受众的“国家形象建设”和面对国外受众的“国家形象建设”两个方面。

在面对国内受众的“祖国国家形象建设”方面，新闻业界的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种新闻手段和载体，向受众传播并从积极建设视角阐释和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提高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可、拥护和支持配合度；传播国家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文化事业、医疗卫生、民生改善、海外撤侨等方面的成绩和进步，并与党和国家的领导、支持、推动和保护建立联系，使受众从中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以增强其爱国情怀；宣传党和国家在全球性灾难或特定国家地区因战乱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时，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动用一切资源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新闻事实，使受众从具体事例中感受到国家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上述有效的新闻传播活动，向受众展示了“可信、可靠、可爱”的国家形象，增加了全国上下的凝聚力。在面对国外受众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方面，新闻业界的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种新闻手段和载体，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传播具有民族特点、特色、特征、特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国外受众对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了解；传播中国政府 and 人民对其他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设施的热情帮助和真诚支持，用实实在在的事例让国外受众感受到中国政府 and 人民的真诚友谊；传播中国政府 and 人民在其他国家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在遇到台风、地震及传染病流行等自然灾害时予以的兄弟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依托新闻媒介通过各种各类传播新闻活动，帮助塑造和形成良好“国家形象”，在增强国外受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可和友善度和增强国内受众对“人民共和国”形象的接受和配合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这一领域“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公民素养建设领域

公民素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作为健康合法当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各种基本素养的总和。一般包括知识文化素养、尊法守纪素养、社会公德素养以及生活技能素养等方面。“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公民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家国天下”的情怀^{[15] (28)}。公民素养决定国家的整体文化水平、道德水平、经济建设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成效，因而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依托各种各类新闻媒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参

与“公民素养建设”这项“国家治理”的重要工作。通过新闻活动向公众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受众群体的整体科学素养，打破文盲愚昧对受众思想、思维的羁绊和束缚，使之成为一个知书明理的公民；通过传播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防安全、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最新成就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激发受众群体立足本职、刻苦钻研、奋发有为、竭诚奉献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争当先锋；通过新闻活动向受众传播普及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受众群体的整体遵纪守法素养，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建成“依法治国”社会中做出贡献；通过新闻活动向受众宣传介绍社会公德的先进模范和典型人物，用遵纪守法、恪守社会公德的榜样引领受众的思维和言行，营造从好崇善的社会风气；通过新闻活动向受众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受众从事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活动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受众的生产效率和效益。

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工作者依托新闻媒介开展的新闻传播活动，可以从多个方面、不同层次对“公民素养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引导功能。随着公民群体整体素养不断提高和升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取得更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更快地实现。

总之，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才引起关注和重视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5] (116)}。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必须始终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参考文献：

- [1] 倪延年. 新青年杂志三次转变与共产党新闻事业起源标志 [J]. 现代传媒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8): 29-35.
- [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告及公告性文件的办法 [A].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 [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9-10.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同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A]. 王培英. 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 [C].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4.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同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A]. 王培英. 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 [C].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97.
- [5] 《中国新闻传播史》编写组. 中国新闻传播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185-186.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490.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282.
- [8]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 [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53-554.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5.
- [10]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A].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0-153.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
- [12] 邓小平.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A].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128.
- [13]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卷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1932.
- [14]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381.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92-93.
- [16]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312/t20131224_161114.html.